



中德风云际会

始于 1840 年的德国在华形象

胡 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德风云际会

始于 1840 年的德国在华形象

胡 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德风云际会:始于1840年的德国在华形象/胡凯
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208-11784-6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中德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近代 IV. ①D82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2902号

责任编辑 顾兆敏

封面装帧 王晓阳

中德风云际会

——始于1840年的德国在华形象

胡凯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4 插页 3 字数 256,000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784-6/D·2358

定价 30.00元

序 言

本书作者胡凯博士是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 40 年任教期间的优秀学生。他从事德语国家历史文化研究多年,在该领域颇有建树,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和作品。对他取得的成绩,我感到由衷的欣慰。我坚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当今,跨越国界的经济活动和商品市场越来越全球化,由大相径庭的文化传统、经济模式、政治体制之间的碰撞、交流、竞争与融合所带来的机遇也随之迅速递增。因此,研究这一领域的课题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选择“德国在华形象”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和研究异国文化对我国的影响恰到好处。在世界近代、现代史舞台上,德国既不是超级大国,也不是微不足道的小国,而是举足轻重的世界强国。当今,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四位,是欧盟的领头羊。凭借其对历史的深刻反省和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形象,以及在处理当今欧元危机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德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作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德国在科技创新、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和教育文化等领域的经验对我国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选择“德国在华形象”作为研究课题,不仅对改善和发展当今中德关系,而且对中国构建良好的国际环境,处理好与邻国及世界各国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是胡凯在其博士论文“19 世纪中国人眼中的德国形象”基础上,经过深入细致加工而成的。中外学界对中国与德国的关系史研究建树不少,在这一领域内发表的文章和书籍颇多,有关“德国在华形象”的书籍同样如此。其中,绝大多数文章和书籍涉及现代和当代中德关系史,即 20 世纪以来的两国关系史,涉及民国时期的德国在华形象的专题文章和书籍较少,涉及晚清的则更少。因此,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对中德关系及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作者不仅搜集了数量庞大、涉及两国外交文档、媒体报道、游记日记等多个方面的各种史料,而且还对其进行了深层次的解读、分析和研究,并归纳、总结出近代中国人对德国具有整体代表性的认识成果。在收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作者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角度,对两国相互影响的过程及其结

果进行价值评判。毋庸置疑,这些资料的搜集、整理、归纳与分析对中德关系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胡凯博士选择从1840年到清王朝覆灭的70年作为研究的时间区域,是十分明智的。1840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凭借炮舰政策,打开了清政府锁闭的国门。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列强,德国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而此时,中国被迫进入社会体制的转型时期。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价值观第一次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文化产生激烈碰撞,中国由闭关自守开始进入对外开放时期。其间,德国在华初期的朦胧形象也逐步趋向清晰与完整。因此,本书研究主题具有“溯源”意义,即从源头阐述和诠释德国在华形象的演变过程,它有助于更清晰地把握近、现代中德关系史的脉络与走向。

本书的重点之一在于对历史的横向对比,寻找当时中国人对德国认识的成功之处与误区,并对认识误区给予高度重视,深入挖掘其产生的原因,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当前我国的对外交往与国家形象塑造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当今,中国正在迅速崛起,由解放前的“东亚病夫”和改革开放前的“东亚穷夫”一跃成为东亚的巨人,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这一新形势下,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妥善地应对国外,特别是邻国对中国崛起的误解、担忧、恐惧乃至对中国形象的歪曲。因此,本书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实践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本书与绝大多数史学著作一样,以历史学为基本出发点,用史料分析的方法诠释和研究近代德国在华形象的演变进程。不同于其他史学著作的是,本书打破学科界限,将形象学、群体心理学、心态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中有关理论引入史学研究,因此能从广阔的视野深入研究德国在华形象的发生和发展,不仅追踪其结果,更关注其成因。本书体现了综合性和多元化研究的特点。应该说,这一跨学科的综合课题研究应用于史学领域的尝试是成功的。

最后,必须指出,本书选择的课题横跨两个世纪,因此涉及面广,重要历史事件数不胜数。如要全面、完整、深入细致地刻画德国在华形象发生的每个细节乃至全过程,殊为不易。因此,本书的某些章节的史料尚欠不足,分析不够透彻也在所难免。但从整体评析,本书不失为研究中德关系丛书中的一颗明珠。

姚 宝

2013年6月于上海

目 录

序言\1

绪论\1

一、基本概念の界定\1

1. 形象与形象学\1

2. 国家形象\2

3. 国家形象生成机制及构建过程的主要环节\3

二、研究课题的选择及研究意义\5

三、关于本书的研究对象\9

1. 对认识对象的界定\10

2. 对德国形象构建主体的区分\10

四、研究方法和材料的选择\11

第一章 雾里看花——1871年前的德意志在华形象\15

一、中普建交之前中国人对德意志的认识\15

1. 缘起——中德之间的早期往来\15

2. 记载中国人早期对德认识成果的著作\22

二、“普鲁士通商案”和官方的德意志在华形象的构建\27

1. 清政府对交涉对手的认识基础\28

2. 不佳的第一印象及清政府对德意志的最初定位\35

3. 谈判的波折及普鲁士形象的恶化\38

三、洋务新政的实施与德意志在华形象的发展\44

1. 洋务新政对中国对外认识机制的整体影响\44

2. 实地考察及德意志在华形象的发展\50

3. 中奥通商换约\55

第二章 中德关系的黄金时代和德国在华形象的发展\59

一、从《普法战纪》到《五述奇》——德国研究专著的相继问世\59

1. 《普法战纪》对普鲁士胜利原因的分析\60
2. 《普法战纪》对德国在华形象的影响与改变\66
3. 对德研究成果的相继出现\69

二、“以德为师”的中国军事近代化\75

1. 中德之间的军火贸易\75
2. 中国近代海军中的“德国品牌”\78
3. 军事领域的人员交流\82
4. 对德国军事体制的深入学习\87
5. 对清政府在军事上“以德为师”的原因分析\91

三、德国在清政府外交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95

1. 德国在历次中外纠纷中所扮演的角色\95
2. 李鸿章访德——笙歌中的危机\101
3. 德国在清政府外交战略体系中的地位\106

第三章 清王朝末期德国在华形象的跌宕变化\112

一、强占胶澳——德国在华形象的转折点\112

1. 潜在的危机——德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性转变\112
2. 涌动的暗流——山东地区频繁的民教冲突\118
3. 巨野教案——清政府对德认识的转折点\127
4. 胶澳事件在媒体中的反映\136

二、从胶澳事件到庚子国变——德国在华形象的不断恶化\141

1. 德国殖民者对华人的轻贱以及“即墨孔庙事件”\141
2. 德国人的武力征服以及中德冲突的不断升级\146
3. 庚子国变中侵华的急先锋\150
4. 叩拜礼的屈辱\156

三、清末宪政改革以及中国对德国的重新认识\161

1. 20 世纪初德国对华政策与中国对德方略的再度调整\161
2. 清末宪政改革的前奏与启动\165
3. 中国人对德国政治体制的早期认识\169
4. 宪政考察团的德国之行\174
5. 对德国军事的重新解读\178
6. 清末宪政改革模板选择的决定性因素\182

结论\190

参考文献\194

- 一、中文\194
- 二、外文\209

后记\212

绪 论

在介绍德国在华形象于本书所考察的历史时段里生成与演变的过程之前,有必要先对该研究课题所涉及的概念、构架、资料搜集和研究方法等相关内容加以解析与说明,即通常所说的“释题”。

一、 基本概念の界定

1. 形象与形象学

谈到“形象”,论者往往首先将其视为一个属于文学范畴的概念,认为是“文学艺术把握现实和表现作家、艺术家主体思想感情的一种美学手段;是根据现实生活各种现象加以艺术虚构所创造出来的负载着一定思想情感内容,因而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具体生动的图画”。^①此项定义揭示了“形象”概念的两种重要属性:第一,形象具有物质本源性。形象的创造是以主体对现实的认识活动为基础的。现实是形象的来源,认识活动则是形象塑造的必要途径。如果缺少来自现实中的素材,主体创造的形象便失去了依托,而认识活动则是连接现实与形象的纽带。第二,形象来源于主体对现实的认识,是客观现实作用于认识主体的主观映像。由于塑造形象的过程同时也是主体的创造过程,因此形象本身也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对他人或事物由其内在特点所决定的外在表现的总体印象和评价”。^②一种形象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和审美意义往往是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互动关系的集中体现。而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形象学的研究对象是“形象的本质及其策划、塑造、管理、传播等过程的规律”,它研究形象的发生、发展,“目的是要从历史的维度来探讨形象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现实性”。^③而研究形象学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赋予了“形象”概念更广博、更丰富的内涵。比如,

① 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907 页。

② 秦启文、周永康:《形象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 页。

③ 秦启文、周永康:《形象学导论》,第 18 页。

罗长海在其论文中从哲学的层面将“形象”概念解析成为个体形象、类形象、组织形象、艺术形象和创造形象等五个层次。在他看来,文学形象或者艺术形象只是“形象”大概念中的一个分支。而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国家形象”,则更应属于组织形象的范畴。^①

2. 国家形象

一旦国家成为认识的对象和物质载体,主体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形象便是国家形象。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学界对国家形象的诠释不尽相同。新闻传播学将国家形象定义为“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②而从国际关系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分析,则可以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③显然,国家形象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军事、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的所作所为都是该国国家形象的构成要件。或引用刘明的定义,所谓国家形象,就是在上述各个领域里,“现实的与历史的客观存在,在认识主体(包括政府、政党、社会集团、组织机构、大众等)中所形成的模式化的总体印象和群体观念”。^④但必须指出的是,主体构建的国家形象并不总是完整的,不必涉及方才提及的所有构成要件。相反,因为受到主体认识机制的影响,国家形象的构建往往有侧重点。况且在一般情况下,主体——尤其是外部公众——根本不可能获得以上所有方面的真实信息。因此,国家形象的构建基础往往是主体对上述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认识结果。

以认识主体为参照,国家形象的内容可以分为外部评价和自我评价两部分,分别是外部公众(即外国人)和内部公众(即本国人)对国家的态度与看法,或称之为国家的“他我形象”和“自我形象”。^⑤它们的实施主体不同,因而相对独立,所以不必,也不可能要求两者时时保持一致。就国家形象的外部评价而言,由于它也是形象的一种,所以各种有可能影响形象塑造的因素都会制约其构建。从主体的认识机制来看,外部公众的立场、观点、经历和价值观念等都可能对它产生影响。国家形象外部评价的形成始于作为主体的外部公众的认识活动。而主

① 罗长海:《关于形象五层含义的哲学思考》,《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3期。转引自秦启文、周永康:《形象学导论》,第3—5页。

② 徐小鸽:《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载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现代传播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③ 管文虎:《国家形象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④ 刘明:《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外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⑤ 参见管文虎:《国家形象论》,第23—25页。

体在认识过程中对信息的取舍和评价均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判断认识信息是否具有可接受性,也是由主体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另外,考察认识主体构建国家形象的过程,还应分析主体获取信息的可能性。一旦信息流通受到阻碍或干扰,主体构建的国家形象便会随之偏离客观的事实基础。一般情况下,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在价值观念、文化背景、思维及行为方式等方面越接近,国家形象的外部评价和自我评价之间的共同点就越多。反之,两者之间的差异就越大,甚至有可能截然相反。明清时期西方国家在中国人眼中的形象与西方人自我认识之间的巨大反差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纷争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形象的塑造,“从国家自身来讲,是一种自觉设计的结果”。^①所以,就国家形象的自我评价而言,作为认识主体的内部公众在完成认知、接受和评价过程的同时,也在根据自己的意志自觉地改变着国家形象,并使其向着主体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毕竟“国家治理和对外交往不可能是无理性的盲目行为,同样,哪个国家都不愿意接受不好的形象评价”。^②由是观之,国家形象的外部评价和自我评价虽然彼此独立,却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一方面,外部评价对自我评价的主体发生作用,无论这种作用是肯定的、积极的,还是否定的、消极的,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内部公众采取行动,或继续发展,或力求改变当前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外部评价归根结底还是外部公众对认识对象自我设计所作出的反应。所以,对国家形象的设计与改变又将赋予外部公众新的认识信息,令其在新的认识基础上修正其评价的内容。这一过程周而复始,使国家形象的发展变化呈现螺旋上升的态势。也有学者认为,实际上存在着三种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国家形象:“一种是具有不可描述性的国家形象的‘源像’;一种是本国系统中主控族群所力图树立的形象;第三种是国际信道传输和其他国家主控族群所描述下的一国的形象。”^③对于同一个认识对象而言,后两种形象对应于上文中提到的国家形象的自我评价和外部评价。至于“源像”,则因为受到内部公众的加工、粉饰甚至掩饰,很难为外部公众直接获得。而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则是后两者为争取在受众中的合法化而进行博弈的结果。本书所讨论的德国在华形象,则主要是以中国人为认识主体,由他们完成的对德意志国家形象的外部评价,是在相应的时间区间里在中国具有较大影响力,乃至占据主导地位的认识结果。

3. 国家形象生成机制及构建过程的主要环节

作为观念的一种,国家形象的生成有自身的规律与特点,其过程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①② 孙津:《赢得国家形象》,河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③ 张毓强:《国家形象刍议》,《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30页。

对于外部公众而言,认知是国家形象构建过程的起始环节,其核心内容是信息的摄取。就信息来源而言,主体既可以通过与对象的直接接触完成认知,也可以借助第三方间接地获取认知信息。认知环节在国家形象塑造与修正的过程中会不断地重复出现。一旦通过认知获取的信息量突破某种临界值,主体就有可能调整与改变已经建立的国家形象。因此,认知是国家形象发展与变化的重要动因,也往往是形象修正周期的起点。

对比是主体在处理所获取的信息时经常使用的方法。^①对比首先发生于“自我”与“他者”之间。这种对比既受到集体的无意识的影响,亦受作用于一些“理所当然的、被人接受了的或虚无缥缈的观念”,还会受到一些“老生常谈,礼仪和道德规范,要遵循的惯例或禁条,公认的必须采用的或不准使用的感情和幻想的表达方式”的制约,也就是说,受到心态、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的综合影响。^②这种对比所体现的,既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思想差异、观念冲突与文化适应,又是主体以自我为中心、往往带有排他性的认识机制与接受习惯。而当主体面对一个全新的认识对象时,主体经常会不自觉地将认识对象与自己较为熟悉的客体加以对比,并将自己对后者的了解移植到认识对象上,甚至将后者视为分析和评价认识对象的标准。比如在“普鲁士通商案”中,清政府将普鲁士与英法等国相比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最初的“德意志—普鲁士在华形象”便是这方面的实例。需要指出的是,主体实施的对比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对于某个确定的认识对象,主体会将其在不同时期构建的国家形象加以纵向的比较,以分析国家形象的发展过程及趋势。此外,主体还会对不同认识对象的国家形象进行横向比较,并为进一步的价值评判奠定基础。

价值评判是国家形象构建过程的重要环节。在“自我”与“他者”的对比中,价值评判便已然存在。在这个环节里,主体的行为必然受到其固有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以及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同时,价值评判的结果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主体对国家形象的性质判断,继而决定主体对认识对象的态度。主体在塑造异国形象的过程中,“常常是以自我文化为中心,判断和确定被塑造对象。简而言之是把这个国家框定为好的或者坏的两个极端之一极,再按照观察者所积淀的文化内容进行取舍,有繁有简、方式不一”。^③以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人对西洋各国国家形象的构建为例:由于受到传统的“天朝大国”思想和扭曲世界观

① 按照法国形象学大家亨利·巴柔的观点,对比与比较是构筑形象概念的重要内容:“所有的形象都源于一种自我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多么微不足道),它是对一个与他者相比的我,一个与彼处相比的此在的意识。”(丁磊:《国家形象及其对国家间行为的影响》,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② 参见菲利普·阿里埃斯:《心态史学》,载J.勒高夫等:《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③ 姜源:《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意义》,《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67页。

的束缚,清政府乃至许多当时的中国人都对西方国家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罔顾这些国家先进的文化科技水平和强大的综合国力,无视其领先于中华帝国的文明发展进程,片面而主观地认定它们为落后、未开化的夷狄。显然,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西方国家在华形象自然带有很强的负面性。

反思是国家形象构建过程的关键环节,是主体结合自身情况对国家形象所作的能动思考。究其实质,反思也是认识主体在形象构建过程中实施的对比,而参与对比的另一个对象首先是主体对本国形象的自我设计。通过反思,主体不但会调整与认识对象的交与策略,而且还能从认识对象那里找到可资借鉴的东西和应当吸取的教训,并将其添加到对本国形象的自我设计之中。因此,反思是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是主体用认识成果指导实践的环节,同时也是国家形象作用于国家间行为的过程,是掌控两个主体之间互动方式与维度的方向盘。从这一点上分析,闭关锁国、“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夷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相维相制、观摩受益”等都是建立在反思基础上的外交方针,而洋务新政、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则是中国对他国形象的反思结果在实践中的体现。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形象与国家间行为与关系之间有着动态的匹配与制约关系。国家形象影响国家决策层,作用于由其制定的外交政策并制约国家间关系。这种制约往往并非即时生效,却有相当强的惯性。同时,国家间关系的处理过程与结果亦会导致交与国形象的转变,并在新的层面参与对国家间关系走势的修正。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国家形象的构建也是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过程。与认识客体及相关信息的接触标志着主体感性认识的开始,而通过对信息的分析处理作出的价值评判则意味着主体已经实现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经过理性认识阶段,主体构建的国家形象将主体的认识与实践联系在一起。通过多次构建国家形象的实践,主体便能新的基础上建立起评判国家行为的价值尺度,并以此指导主体与对象国家之间的交往。同时,立足于更高层面的实践也将成为下一个认识周期的起点。

二、研究课题的选择及研究意义

德国在华形象研究是具有历史跨度的课题,从早期的雏形到现当代德国在华新形象的建立,其演变过程至少可分为晚清、民国、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德国在华形象相互关联,各具特点。如结合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德关系史上的重要断点,则可对上述四个阶段作更为细致的区间划分。本书所选择的考察时段,以被视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1840年为起点,延续至辛亥革命前夜,即史学界所谓的“晚清七十年”,这也是近代中国人开始全面接触世

界、认识世界并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阶段。在此之前,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令中国人与外界的接触微乎其微,因而他们很少有获取认识信息的可能性。以对德国的认识为例,虽然德意志传教士和德意志商船来华为中德双方提供了互相了解的机会,但鉴于彼此之间极低的交往频率,这种零星的接触很难帮助中国人深化对德意志的认识。信息流通的阻滞妨碍了中国对包括德意志在内的外部世界的认识,因而此时的交往与认识只能被视为德国在华形象构建的早期铺垫。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最终用武力强行打开了被清政府封闭许久的国门。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清帝国已经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继续闭目塞听,而不得不面对诸多的对外交涉。通商口岸的开放以及大批洋人来华也使中国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洋人,了解外部世界,从而令西洋各国在中国人眼中的形象逐渐丰满起来。外交往来的增加也使清政府逐步树立起对包括德意志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官方印象。而从德国在华形象发展沿革的角度看,本书选择的时间区间正是中国人对德意志的认识结构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德国观在认识主体与客体的持续互动中逐步生成的历史时期。所以,德国在华形象发生研究是本书的实质与核心,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追溯德国在华形象的起源,并为对其发展情况的后续跟踪奠定基础。

选择溯源式的德国在华形象发生研究作为课题,主要是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首先,本书以“异域形象”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对异质文明之间碰撞与交流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他者认识的研究既具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作为认识主体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载体,对他者的认识与评价结果是打开认识主体精神世界的钥匙之一。同时,国家形象的构建与发展也是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互动的结果,是联系两者的纽带。所以,国家形象分析对意识形态和文化、国际关系与政治领域的研究工作而言不无裨益。至于包括德国在华形象在内的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从历史的维度对它们加以概括与归纳,分析其发生机制,则不啻为旨在“省己”的自我剖析。正如周宁教授所言:“中国的西方形象,它是中华文明自我意识的反映,是中西关系的晴雨表,也是某种程度上西方现实的写真。……中国的西方形象在近150年的变迁,……都说明中华文明在对西方的‘集体想象’中寄寓着对西方的理解与误解,对自身文明的评价与对中西关系的态度。”^①由此,足见异域形象分析对相关研究领域的价值所在。

其次,尽管本书作为溯源研究,难免翻寻历史故旧,但该课题研究并非只为史海钩沉。晚清时期信息闭塞、沟通不畅,处于认识心理转型期、各方面准备尚未成熟的中国人在面对大量认识信息的时候,由于受到理性及非理性因素的交替影响,对德意志既不乏清晰的洞见,也颇多无奈的误读。而从历史的维度对德

^① 周宁编著:《2000年中国看西方》,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5页。

国在华形象的发生加以归纳与分析,既能寻找失误的根源以自省,也有助于考察近代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对自身文明评价的形成以及对中德、中外关系的态度。因而,本课题的研究成果不仅对中国近代史、近代思想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虽然当前交通便利、信息通畅,全球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但是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成见与误会依然无法完全消除。崛起的中国欲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则必须以不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沟通与理解为前提。这就要求新时代的中国人正确地认识世界形势,努力消除基于意识形态差异、利益冲突等因素而形成的对中国的偏见与误解。所以,我们须以史为鉴,在对外交往中不但要避免重蹈夜郎自大的覆辙,更要妥善应对外界对中国的误解乃至对我国形象的刻意扭曲。而本书的研究工作应能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素材。

第三,之所以聚焦德国,是因为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作为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大国以及欧盟的火车头,德国在中国外交战略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由于既无历史包袱,又鲜有尖锐的利益冲突,中德两国在各类国际事务中交流与合作亦日渐深入。中德关系的良性发展不仅是中国构建良好外交环境的重要环节,而且德国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保障以及教育、法制、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对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而言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也是德国成为包括学术界在内的中国社会各界关注热点的原因。而德国在华形象是德国对自身形象的自我设计与中国对德国认识互动的结果,也是影响中国对德方略以及两国国家间行为的“软实力”。所以,作为德国及中德关系研究范畴的子课题,对德国在华形象的剖析与解构也是符合当前我国对外战略要求的工作。

当然,选择 1840 年至 1911 年为时间区间对德国在华形象进行断代研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对该时段特点及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晚清七十年是中国充斥着斗争与变革、新旧理念激烈碰撞的特殊历史时期。这既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由封闭性转变为开放性”的过渡阶段,又是中国与西方文化价值观“经过对抗、冲突,最后在中国国情的条件下,以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方式融合为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时刻^①,是中国与西方深入交往的开端,也是德国在华形象的发生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着在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研究之外另辟蹊径,从文明碰撞、文化交流、西学东渐的角度诠释近代中外关系。而“外国人看中国”和“中国人看西方”也因此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在“西方各国在华

^① 宋惠昌:《人的发现与人的解放——近代中国价值观的嬗变》,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1 页。

形象”这一研究课题上,学界建树颇多。单以专著而论,对于所有从事“西方各国在华形象”及相关课题研究工作的学者而言,著名历史学家钟叔河先生主持编纂、汇集十数种晚清国人观察世界所得成果的《走向世界丛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周宁教授编著的《2000年中国看西方》横亘浩瀚史海,通过丰富的史料勾勒出从汉朝到当代中国人对西方世界认识的变化轨迹。李扬帆教授的《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从林则徐、魏源、李鸿章、奕訢、慈禧等晚清重要历史人物入手,分析他们在与洋人的交往中改变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树立新的华夷观、外交观和世界观的过程,并结合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对其作出理性的思考和历史的批判。在国别研究方面,近年来一些科研成果探索了历史上中国人对美英等国的看法演变。例如,杨玉圣教授的《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旁征博引,是一部展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美国观发展历程的力作,书中第一章至第四章即以晚清时期为考察研究的时间界点。马廉颇博士的《晚清帝国视野下的英国——以嘉庆、道光两朝为中心》详尽地分析了嘉庆、道光年间清朝统治集团对老牌西方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的认识状况。在“日本在华形象”研究方面,王勇教授的《中国史中的日本像》是对日本在华形象的历史性概括。郑翔贵先生的《晚清传媒视野中的日本》是研究清末中国新闻媒体有关日本报道的专著。孙雪梅博士的《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以直隶省为中心》是对清季日本在华形象地域表征的个案研究。从人群定位的视角出发,尹德翔博士的《东海与西海之间——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则是对外交使节构筑的西方形象的集中分析。相关的专题论文则更多,可谓硕果累累,不一而足。

以德国研究而论,有关专家学者对中德文化交流及“德学东渐”的研究亦取得丰硕的成果。单世联教授的《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叶隼研究员的“中德文化丛书系列”、陈洪捷教授的《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卫茂平教授的《德国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等即为国内研究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中国对德国文化元素迎拒的代表作品。这些成果为学界进一步研究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产生影响的德国元素奠定了基础。同样,德国在华形象研究也并非全新的命题。唐绍成的博士论文《德国在华形象:1870—1989》堪称系统论述“中国人的德国观”的通史性作品。^①由于此项研究须阅读大量中文资料,德国方面仅有少数汉学家有所涉猎。著有《20世纪初中国人的德国观》、《孙中山与德国:论德国在孙中山社会政治思想中的地位》、《从新近出版的档案文献看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和他对德国的态度》等作品的费路

^① Shao-cheng Tang, *Deutschlandbilder Chinas von 1870 bis 1989*, Verlag Peter Lang GmbH, Frankfurt a. M., 1993.

(Roland Felber)教授堪为代表。

然而,考察学界对德国在华形象的研究工作,不难发现亟待开垦的领域依然存在。从总体上看,学界较多关注现当代中国人的德国观,专题论述早期德国在华形象的专著与论文相对较少,比较系统地分析近代德国在华形象发生过程的科研成果更是凤毛麟角。唐绍成博士的论文可谓唯一论述晚清时期德国在华形象的专著。但由于该著作涉及的时间跨度超过100年,而且晚清时期并非作者的研究重点,所以它对德国在华形象的发生难免言之不详。这正是德国在华形象研究的缺憾所在。国家形象作为观念的一种,其演变过程具有渐进性、连贯性和可追溯性的特点。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往往不能囿于其主导时段,而必须通过对观念生成机制的分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动态的、溯源式的解读。以当代德国在华形象为例,仅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综合国力对比、政治经济依存度等方面入手,恐怕无法完整地解答德国在华形象优于美国、日本和英、法等其他欧洲国家的原因。因为这种分析法仅着眼于特定阶段的认识结果,对认识结构的生成机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忽略了历史上正面、积极的德国形象的持续输入及其稳定而持久的影响作用。所以,作为连接历史源头与现实的桥梁,发生研究是国家形象整体研究中无法跳跃的重要环节,其实质在于梳理对形象发展及形象持有者行为决策影响时效最长的因子,确定在各阶段形象构建过程中始终未被舍弃的元素。为此,与唐绍成博士的著作相比,本书将研究的时间起点向前推进了30年。这不仅是因为在1870年前中国人对德意志的认识成果已然生成,更是因为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中外交往对中国人对外认识的知识结构和生成机制影响巨大,改变甚多,不对其详加分析,便无法解释以后各个水平的对德认识的形成机理。而且为保证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本书还有必要超越1840年的时间界限,对德国在华形象的最早期发展加以研究以完成完整的溯源工作。从这点上看,笔者的工作并非重复前人的无谓之举,应能成为德国在华形象研究的有价值补充。

最后,作为一项跨学科的综合课题,本书尝试从历史学角度出发,在分析认识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史料研究勾勒晚清时期德国在华形象演变的轨迹,结合形象学、群体心理学和心态史学的有关理论对其进行成因分析,用国家形象对国家间行为影响理论分析其对中德关系走势的作用,并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角度对两者交互影响的过程与结果进行价值评判。所以,本书也是对近代中德关系史进行多视角、多维度诠释的一次尝试。

三、关于本书的研究对象

毋庸置疑,德国在华形象的认识对象自然是德国。但由于德意志历史的重